

沧桑与变

——图说改革开放30年百姓生活

CANGSANGZHIBIAN TUSHUOGAIGEKAI FANGSANSHIMIANBAIXINGSHENGHUO

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 / 编

陈晓卿 朱乐贤 王才禹 徐凤文 /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们
身边的
三十
个
细节

本书受贵州省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桑之变:图说改革开放30年百姓生活/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221-08270-1

I. 沧… II. 中… III. 社会生活—概况—中国—1978~2008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1432号

书 名 沧桑之变

——图说改革开放30年百姓生活

著 者 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编
陈晓卿 朱乐贤 王才禹 徐凤文/主编

出版统筹 曹维琼 陈 荣
选题策划 王才禹
责任编辑 王才禹 阎循平
装帧设计 王才禹
电脑制作 袁 健 方正林

出 版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 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2
字 数 150千
印 张 18
版 次 2008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08270-1/K·1055
定 价 1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页或装订错误,请与我社或承印厂家联系调换
订书电话 0851-6824533 6829704
打击盗版电话 0851-6829704

沧桑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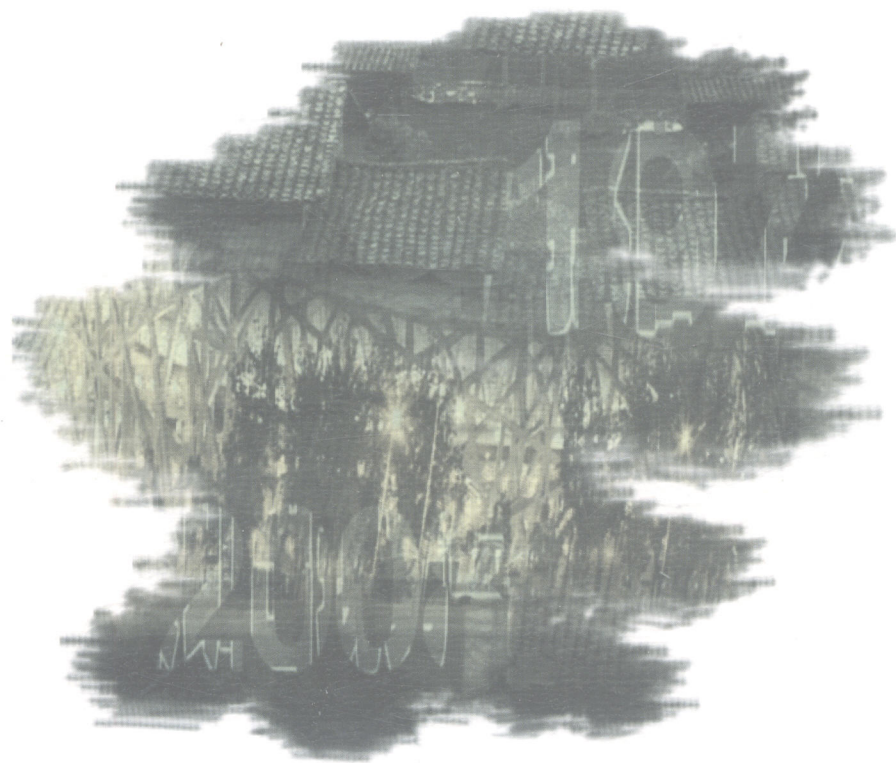
CANGSANGZHIBIAN TUSHUOGAIGEKAIFANGSANSHINIANBAIXINGSHENGHUO

——图说改革开放30年百姓生活

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 / 编

陈晓卿 朱乐贤 王才禹 徐凤文 /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们

身边的

三十个细节



出版统筹/曹维琼
陈 荣
选题策划/王才禹
责任编辑/王才禹
阎循平
装帧设计/王才禹
电脑制作/袁 健
方正林

我们 身边的 三十 个 细节

ISBN 978-7-221-08270-1



9 787221 082701 >

定 价：148.00元

目录

1



进城

进城 张平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从此对农民关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

16



铁饭碗

铁饭碗 张昱 王丛

“铁饭碗”和“大锅饭”都是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铁饭碗是指国家分配工作，干得不好只能调走，绝无失业之忧。“大锅饭”是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和概括。

30



南来北往

南来北往 张平 赵宇 何畔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逐渐从户籍、档案、编制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新生活。这种从“单位人”到“自由人”的转变，正是人打破计划经济的层层限制走向自由选择的过程，也由此带来了一次次人口流动的浪潮。

44



吃嘛嘛香

吃嘛嘛香 王姣

30年前的改革开放，首先从解决百姓的温饱而开始。30年的时间里，中国造就了一个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奇迹，这个奇迹也直接地体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

57



中国屋檐下

中国屋檐下 白晓

从单调、简陋、拥塞到多样、精致、宽敞，从为了分到住房绞尽脑汁调动工作到自己挑选中意的商品房，从筒子楼到单元房，从分房到买房再到合作建房。30年来，住房一直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变化最为明显的一件事情。

71



我们有钱了

我们有钱了 刘兮

30年前，财富对于中国百姓的意义，仅仅在于有了闲钱可以存在银行里，利息虽低，总好过没有。直到今天，储蓄存款仍然是不少国人钟爱的保存财富的方式。储蓄存款数字变化的背后，是30年来中国曲折蜿蜒的求富之路。

90



距离

距离 张昱 周蔓 黄衍华

30年来普通中国人沟通方式的变迁，足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今天，你从哪儿得到资讯？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尽览天下事，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体。

105



到此一游

张平 王菁婧 李雅瑞

在老百姓的话里，“出去玩”大多时候意味着出外旅游的意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们生活水平较低，旅游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如今，外出旅游已成为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121



外面的世界

刘兮

现在，中国77%的高等学校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62%的博士生导师有过出国留学经历。从此，中国出国留学的大门再次开启，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学大潮。

134



我的身体我做主

白晓

3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对健康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爱好、坚持、参与，这是许多健身俱乐部身体文化的具体体现。在新的时代，中国人的身体自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44



玩的就是心跳

陈攀

大自然为那些不安分的灵魂准备了冒险的乐园，变革造就了中国人日益富足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去尝试更多的冒险乐趣，从而证明自身的价值。

161



谁在说

张昱

在新时代的建设中，每一条战线上的人都能找到学习的榜样。英模的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人们传达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30年间，曾有许多人站在我们面前，向我们传递着不同的价值观。

173



走出象牙塔

张昱 孙静

从1978到2008，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与此相伴，中国人的读书生活也不断变幻着场景和主题。30年的阅读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

190



笑声中的记忆

张平

曾经暖老温贫的市井娱乐；曾经走入庙堂的宣传利器；电视晚会上的风光与落寞；商品大潮下的“玩意儿”……笑声中的30年，描摹出一幅幅世俗化生活变迁的图景。

200



足球是圆的

张昱 马骁

30年，中国体育逐渐回归自身。就像中国足球，在国际上的排名虽然没有提升，但国内的球迷仍然执著依旧。三大球类运动中，足球最受国人关注。足球冲出亚洲，无疑是球迷心中最大的梦想……

进城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的大门从此对农民关闭。

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格苛刻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民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

进城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现波澜壮阔之势，酿就了混合着成功与辛酸、喜悦和泪水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外来妹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
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

一曲《外来妹》，既让刚刚出道的杨钰莹一时间红遍全国，也常常让走南闯北的硬汉子无语凝咽。1991年，作为春节后的首播大戏，十集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立即轰动全国。一夜间，《外来妹》的主题歌和插曲唱遍全国。

《外来妹》讲述的，是六个打工女性从偏远山村来到广东后彼此的不同命运。这是最早反映广东一带外来打工者的一部电视剧，剧中的“外来妹”一词也由此走出广东，成为全国通用的词语。

同年，在一部歌颂珠海改革开放十年成就的纪录片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外来妹”的身影。影片中这些年轻的农家女孩，留着时髦的发型，穿着也在向城市姑娘靠拢。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是她们在城市里的安身之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们的住所毫无个人空间可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打工潮不是始于男人，而是从女人到经济开发区打工开始的。中国第一代外来妹，恐怕得追溯到1982年。这一年，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投产了一家由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兴办的玩具厂。当时，这家工厂从广东各地农村招募了上千名年轻姑娘，占到当时蛇口外来妹的“半壁江山”。其后，越来越多的广东落后地区的年轻人进入广州、深圳等地打工。这些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获得传统的称呼——“工人”，而是被统称为“打工者”。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尤其是外地的农民数量微乎其微。城乡分割的二元制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城有着严格的控制。

中国的改革，起始于乡村。1978年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后不久，国外有位观察家曾预言：“大包干”使中国农村生产力获得大解放，等于叫醒了一只“睡虎”，但即将迎来另一只“饿虎”——中国解决不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

1984年，中国的农民面临着卖粮难的窘境，农业生产收益下降，农村中又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央政府在这一年出台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实际上为农民进城务工打开了一个口子。

现实的压力与市场经济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让农民获得了进城工作的权利。伴随着农民进城，出现了许多带有时代特点的新词汇。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打工妹



外出务工人员的住校区



在车间上班的打工妹

【30年·那些词】

- 农民工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
- 盲流 1987年4月27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首次使用“盲流”一词。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一度成为进城务工农民的特有称呼。
- 民工潮 1989年春，随着外出务工农民大量增加，铁路客运出现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民工潮”一词出现。
- 外来务工人员 1997年以后，“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农民工的正式称谓。



民工潮
(张新民 摄)



十人一房
(张新民 摄)

民工潮

随着1987年3月“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的开幕，无数内地青年也开始带着梦想和激情，告别家乡，踏上南下的列车。浩浩荡荡的打工潮由此拉开序幕。“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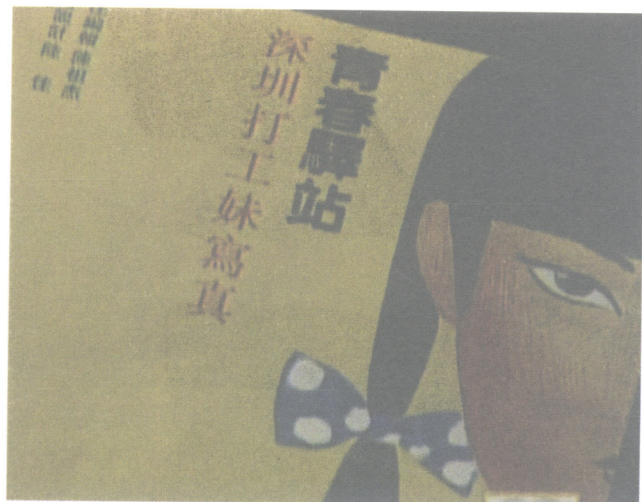
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所在的珠三角地区，是早期进城农民的主要流入地。在这些外来者汇聚的移民城市，传媒最先关注到打工者的生活。

1992年深圳电台节目《安子的天空》有这么一段录音：

只身一人闯荡特区，肯定有苦辣酸甜的打工故事。在打工生涯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坎坷。逢星期日下午从三点到四点，‘安子的天空’……我是安子，我们都来特区寻梦，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这是属于百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天空。透过电波，我愿与你共同编织这青春的天空。

进城





安子著的《青春驿站》

1992年，深圳出现的这一档广播节目“安子的天空”，它关注的是打工者群体的情感。节目主持人安子，是来深圳八年的打工妹。上一年《深圳特区报》连载了她写的19位打工妹的故事，被称为都市边缘人的打工者，第一次看到了描写自己生活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打工者都有一个普遍的心态：打工的城市只是生命中稍作停留的驿站。

在另一部记录特区发展的系列片《在珠海这片土地上》中，开始出现有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内容。当时，珠海市政府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每月325元，同时设立劳动监察科和劳动监察大队，处理劳资矛盾。

中国的改革开放，试图通过逐步建立市场经济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完成，全球制造业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人口众多的中国随即成为“世界加工厂”，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了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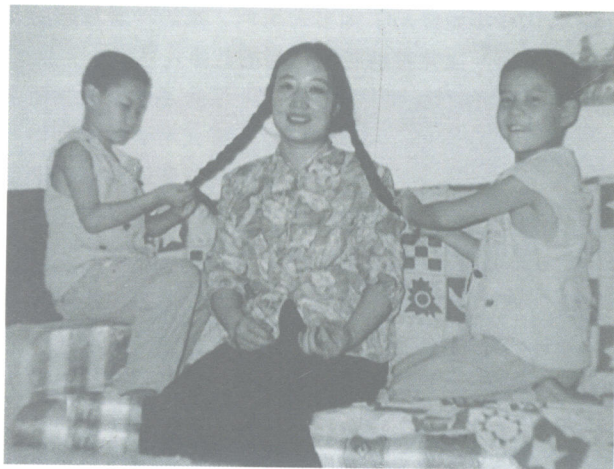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只有15万农民工。到90年代中期，农民工接近3000万。1996年深圳总人口有345万人，本地户籍人口88万，而在外来的129万人中，有83.6万是女性，占6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平均年龄只有23岁。但这些农民工普遍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波澜壮阔的“民工潮”随之产生。

远在北京的家

1992年春节，在人们普遍关注特区这片热土的时候，一个摄制组来到安徽省无为县赫店乡，拍摄即将离家去北京打工的女孩。

【30年·那些事】

- ☐ 1995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旅客运量达到14.28亿人次。
- ☐ 1994年年底，为缓解春运压力，《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号召60%的农民工留在当地过年。
- ☐ 1995年春节前，中国第一架民工返乡包机从深圳机场起飞。
- ☐ 2006年1月，中国政府提出：春节为民工加开的列车不涨价。



外出打工的谢素平1994年离婚，自己一人养育一对双胞胎儿子。

进城

当年的无为以“出保姆”闻名。与其他劳务输出地区一样，无为人多地少，工业匮乏，农民收入有限。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儿长大成人后都要自己到外面去闯荡一番，最多的工作是做保姆。

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等五位农村姑娘都来自安徽省无为县。1992年的新年过后，张菊芳等五人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京城寻找挣钱的机会。陈晓卿的这部片子记录了此后一年里她们的生活状态。这是生活颠沛不宁的一年，寻找工作，被辞退，再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寻找一个安身之所，独自面对艰难。

影片的其中一个主人公张菊芳，由于不熟悉城里的家务劳动，仅工作三天就被雇主辞退。影片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展现张菊芳在第一位雇主家中手足无措的样子，这种无力感同样展现在她对未来的把握上。

十年之后，将自己的人生交付给命运的张菊芳已经结婚生子。在上海郊区的崇明岛上，一家三口靠种田过活。从少女到母亲，张菊芳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前辈们走过的道路。对稳定生活的渴望让她重新返回了乡村。

《远在北京的家》中的另一位主人公谢素平，原本是河南人，打工时与来自安徽无为的丈夫相识结婚，并有一对两岁的双胞胎儿子。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谢素平毅然决然地离开儿子、出外打工的场景。

1992年夏天，谢素平在北京照看着一个同样两周岁的孩子。对于远在为的儿子，她只能委托摄制组捎去礼物。

亲情的难以割舍，几乎是每位进城打工者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

影片特意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将被拍摄者的影像放映给她们远在家乡的亲人观看。户籍制度限制造成的城乡阻隔，让中国式的农民进城，始终面临家庭成员间的长期分离。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多年后才广受关注。

《远在北京的家》播出一年后，编导陈晓卿曾经邀请谢素平来电视台看这部纪录片。看片从头至尾，她一直在流泪，直到这次回访的时候，导演才了解到这些年她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今年已经十岁了，他们也是第一次完整地听到母亲的故事。

谢素平在1994年离婚。两个儿子先是被寄养在河南老家，最终又回到母亲身边。几经周折，两个儿子在一所武术学校上了初一。因为是民间机构兴办的学校，招生、入学手续很简便，就读的两百多学生，大部分也都是外地人的子女。

当年来京打工的五个女孩中，只有谢素平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十年间，她考取了厨师执照，在烹饪比赛中得过大奖，一直做着厨师的工作。然而身份问题仍困扰着她和孩子们。

影片的结尾，谢素平自己开办了一家小饭馆。但几个月后，她不得不放弃这家饭馆，离开生活多年的房山区，举家搬到北京城郊的长辛店，这里的一所中学同意接收她的两个儿子入学，并且不收取任何赞助费。孩子上学有了着落，谢素萍自己的工作却成了问题。



年轻的打工妹张菊芳不习惯城市生活，重回家乡结婚生子。



张菊芳和丈夫原先都在上海做工

【30年·那些事】

-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每年只有万分之二比例的“农转非”户口指标。
-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城市收取城市增容费，接受农民成为市民。
-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出现蓝印户口，这是介于“暂住”和“常住”之间的过渡性户口制度。
- 2001年，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率先进行户籍改革，降低农民进城条件。
- 2003年，各级政府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



进城务工青年有了就业绿色通道
(CNSPHOTO提供)



进城初期的刘红春

尽管失去了工作，但谢素平仍然坚守在长辛店。谢素平把她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为了让孩子们不再重复自己的生活，她坚定地寻找着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改革开放让农民获得了择业的自主权，冲破城乡分割进入城市就业，但今天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而是渴望融入城市，像城里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正是农民进城的渴望促使着政策不断发生转变。

无为到北京有近1200公里的路程，要先坐汽车到合肥，再搭乘火车到北京，路上要花费两天的时间。

这些对城市全然陌生的女孩，要克服的远不止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在与城



进城后的刘红春

进城

市磨合的过程中，巨大的心理落差横亘在她们面前。努力融入城市，却并不被城市接纳，她们面对的是城乡差距带来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错位。

十年之后，摄制组再次来到当年拍摄的起点——安徽无为汽车站。刚刚落成的新车站里，每天都有发往上海、北京的直达班车。无为县城车水马龙、商铺林立，与十年前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

摄制组重新寻访当年的拍摄对象，最先找到的是刘红春。当年她只有14岁，是同行五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十年后，她已在上海成家立业，并与新婚的丈夫回家探亲。

十年前，刘红春初次进入城市，对陌生而新鲜的城市生活充满好奇。到北京后不久，她又到天津当保姆。一年后，当她回到无为时，不管口音还是发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记者：你在别人家里帮忙，她们对你好不好？

刘红春：挺好的。嘛好吃，嘛都叫你吃。

记者：你这都是天津话了。

这些农家女孩进城之后，她们的心理、生理、语言和非语言的形体特征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转变，但最大的变化却是观念。

记者：不管上哪都要走？

刘红春：对。

记者：现在还没定？

刘红春：对。等过完年再说。

记者：你自己想到哪儿呢？

刘红春：我想不是天津就是北京。

记者：不想去上海？

刘红春：上海人说话倍儿难懂。



刘红春上海的家



十年后，刘红春已经讲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因为嫁给一位上海人，她最终留在了城市。上海市目前的户籍制度规定，与有上海户口的本地人结婚，婚后必须在上海居住14年，才能拥有上海户口。户籍制度人为地划分出城里城外，但刘红春已经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的家。她的生活也越来越像一个上海人了，临走的时候，她告诉编导：“坐出租车要坐大众的和强生的，其他的小公司的不要坐，他们不给你开空调的。”

同样是来自安徽农村，多少年以后，今天已很难从北京中关村电脑销售商栗洋身上找到多少“土味儿”。1991年淮河特大洪灾后，这个青年农民捆起一床旧棉被，离开了当地人称作沿淮“老灾窝”的安徽霍邱县冯井镇，闯到中关村打工。他做过搬运工、泥瓦匠，最后搞起了电脑处理器CPU的经销。经过多年“夜里睡冷地板、白天做小老板”的磨砺，他拥有了数百万元家产。

走进城市的打工群体，已经由暂时打工向职业非农方向转变，城市正在成为他们期待中的家。

山城里的棒棒

纪录片《棒棒》，拍摄于1996年，完成于2003年。用了七年的时间，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农民融入城市的经历。



进城

在重庆，“棒棒”是一个特定称谓，指的是那些手拿木棒扁担，守候在路边街头，随时准备为行人提供劳力服务的人力挑夫。

影片的主人公刘晓箫，和大多数涌入城市的农民一样，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1993年，他离开家乡到重庆打工。没有经验，没有本钱，初中文化程度，刘晓箫只能选择加入棒棒大军，靠出卖体力、打零工生存。与其他棒棒不同，刘晓箫爱好文学。对他来说，写文章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梦，也是谋生的手段。

影片记录下“棒棒作家”刘晓箫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也是进城农民的生活写真。七个人的午餐一共花费了19元8角，十几个人挤在一处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影片很大篇幅都在展现刘晓箫怎么努力去改变物质生活上的窘迫，这也是刘晓箫们在城市里打拼的原动力。

1996年中秋节，三年不曾回家的刘晓箫决定回家看望父母。三块钱一个的月饼，他只买了四个。

刘晓箫的家在四川省富顺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距离重庆有300多公里路程，离最近的乡镇也有十几公里。全村人均只有几分耕地。在刘晓箫离开家乡的那一年，村里70%的家庭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债务。

这次回家给了刘晓箫很大的触动。

急于改变命运的刘晓箫，停止了文学创作。1998年，他与朋友合作，开办棒棒军服务公司。“棒棒作家”开办公司，引起许多重庆媒体的关注，刘晓箫一夜之间成为重庆名人。

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刘晓箫的名声越来越响，他的生意也风生水起。2003年，刘晓箫还接受了英国、日本媒体的采访，成为棒棒中的成功典型。

2003年，刘晓箫花费12万元，在重庆购买建筑面积80平方米的住房，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在城里。

作为公司管理者的刘晓箫为员工制定了奖惩条例。公司里，大多数员工和刘晓箫一样，来自农村。他们同样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如今，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者已达一亿三千万人，他们的存在呼唤着更好的制度安排。

当刘晓箫在城市中落户后，影片画上了句号。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许多大事：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香港回归，三峡大坝合龙……

纪录片的结尾回顾了刘晓箫的进城经历，他是被城市化大潮带进城里的一员。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直观变化，是城市越来越大，楼房越来越高，居民越来越多。然而更让人期待的是，城市能为栖身其中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七个人的午餐一共花费了19元8角



“棒棒作家”开办公司



刘晓箫接受了英国媒体的采访

【30年·那些事】

- 2004年，陕西农民孙武胜成立维权工作室，被媒体称为农民工的“讨薪代言人”。
- 2006年，《深圳特区报》把深圳打工者的代表安子称为深圳创业传奇人物，与QQ之父马化腾、巨人集团史玉柱并列。
- 2003年，在深圳打工致残的祝强和袁云祖成立“深圳志强信息咨询部”，从受害者转变为维权者。
- 2008年，三位农民工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 农民工中的代表，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始成为群体的代言人。



南京一民工依法讨回工资
(CNSPHOTO提供)

“我的名字只能大写”

2006年重庆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进城》，讲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进城故事。影片主人公李珍鹭是重庆市黔江区石会镇村民。农民李珍鹭说，“我的鹭字，意思是：骑在马上，受人尊敬，所以我的名字只能大写。”

李珍鹭一直努力掌控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了一亩三分地的乡村生活。本来，他是不想进城的。2003年，为了女儿读书，李珍鹭第一次有了进城的打算。在决定进城后，他先去重庆参加厨师培训，拿到了高级厨师资格证书。此后，李珍鹭几次进城打工，在小饭馆里当厨师，做主厨。

如今，农村年轻劳力进入城市，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生活在西南山区的李珍鹭一家，也难以摆脱这一趋势。纪录片的很多段落都在展现李家人对于进城的不同态度，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

李珍鹭的哥哥李华强在城里开饭馆，已经完全脱离了乡村生活。而李珍鹭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取舍。



李珍鹭的全家福